

记北京图书馆所藏郑振铎日记和文稿

陈福康

郑振铎是我国现代文化史上一位著名的作家，又是一位杰出的文学史家、艺术史家，还是一位难得的文献学家和藏书家。他对我国文化学术事业的建树是多方面的，是“五四”以后以鲁迅为旗帜的进步文化界中少数几个“全才”式的人物之一。他善于团结人，具有卓越的组织能力。我国第一个新文学社团“文学研究会”，就是以他为核心发起组织的；“左联”成立以前成立的“中国著作者协会”，他是主要的组织者之一；“左联”解散时，他又受党组织的委托出面与各方联系，发起组织了“中国文艺家协会”；抗战后组织的全国文协，以及解放后的全国文联与作协，他均是重要领导人之一。他先后主编过《学灯》、《文学旬刊》、《小说月报》、《文学周报》、《文学》、《文学季刊》、《文艺复兴》等重要文学刊物，还曾主编过《文学研究会丛书》，发表和出版了上百个作家的大量的作品。

郑振铎一生驰骋文坛，执笔不辍，又有不少宏心勃勃的写作编撰计划，猝然去世后，遗留下一大批文稿日记。这批值得我们及子孙后代高度重视而数量又极为可观的文化遗产，现正珍藏于北京图书馆善本特藏部。^①

1982第2月《文献》第4辑（总第6辑）上刘烜同志的《郑振铎〈日记〉手稿》一文，最早披露并论述了郑振铎日记手稿，使世人知道有这样一笔珍贵遗产，并得以读到所引录的一些精彩

片断，十分难得。但是，该文叙述尚有未详及疏误之处，故再撰此文，作为补充。

今存日记数量

现存北京图书馆的郑振铎日记数量，今列表说明如下：

年份	起迄日期	备注
1927年	11月28日至12月31日	自裁小纸片，共12页，一札
1928年	1月1日至2月9日（其中2月13日至20日缺，2月21日残）	
1943年	2月2日至8月6日（其中7月26日至8月1日缺）	小信笺，共298页，散页
1944年	1月1日至12月30日	小台历，共365页，一札
1945年	6月1日至10月19日	小台历，共137页，一札
1947年	1月6日至12月31日	台历，共360页，一札
1948年	1月1日至7月1日	“生活日记”本，一册
1949年	3月29日至5月26日	“袖珍日记”本，一册
1953年	11月12日至12月12日	活页纸，杂于工作笔记中，散页
1954年	11月21日至12月31日	小活页纸，一札
1955年	1月1日至3月21日	
1956年	6月24日	活页纸，杂于工作笔记中，一页
	3月27日至5月16日	活页纸，杂于工作笔记中，散页
	11月13日至12月18日	
	9月15日至19日	
11月1日至10日	“1956年美术日记”本，一册	
1957年	1月1日至12月31日	
1958年	1月1日至10月16日	“美术日记”本，一册

此外，在北京图书馆所藏郑振铎文稿中，尚有被题为《访书目录》（按，当为“日录”）一册，共20页，亦带日记性质。所见共22天，日期为：

1942年 12月5日、8日

1943年 1月26日 2月14日、15日(残) 3月1日、
2日 5月26日、29日、30日、31日 6月2日 8月25日、
30日 9月7日、9日、18日 10月19日、25日、26日、27
日 12月2日

郑振铎生前曾有经过他自己整理、润色而发表的日记两种。一是《欧行日记》，1934年10月31日上海良友图书印刷公司出版，为1927年5月21日至8月31日的日记。二是《求书目录》，1945年11月21日至12月30日上海《大公报·文艺》发表，为1940年1月4日至2月4日的日记（有关于“求书”者）；1946年6月1日《上海文化》第5期，又发表1940年2月5日一则。上两种日记，前一种据作者说因日记原稿散失，仅整理发表原稿的四分之一；后一种因《大公报·文艺》版面过小，又常脱期，因而中辍刊出（又拟在商务印书馆出版，亦未果），仅整理发表了原稿的二十四分之一（原拟发表至1941年“一二·八”战争止）！而除了北京图书馆所藏的1927、1928年的12页简单日记以外，这两种日记原稿今均未见，这真是莫大的遗憾。我们多么希望天壤间还保藏有这些日记啊！

日记所记的交游与蛰居生活

郑振铎的日记，真实地记录了他的生活、学习、工作、战斗的历程，具有极高的史料价值。由于郑振铎的日记（及笔记）的内容极为丰富，就象一座未经发掘（或未经认真发掘）的宝山，本文所作的工作只是象随手从中掇拾了几块宝石而已。

郑振铎一生待人极为真诚直率。郭沫若在1921第一次见到他，就感到他是一位用日本话叫作“无邪气”的人。叶圣陶在1924年为《天鹄》一书写的序中，称他是一个“大孩子”。而在他牺牲以后，俞平伯在悼文中仍然称他是“兴高采烈，活泼前进，对一

切人和事都严肃认真，却又胸无芥蒂的大孩子。”这种人情美是令人向往的。而在他的日记中，则处处可以看到这种品德的闪光。今随便举一些例子。

耿济之是郑振铎“五四”时代的老友，文学研究会的重要发起人之一。郑振铎日记中大量记载着他们的交往。特别是抗日战争上海沦陷期间，郑振铎与他“相濡以沫”，共同保持坚贞的民族气节，在日记中多有反映。1947年3月4日，郑振铎得知耿济之在驻外（苏联）工作中不幸逝世的消息时，在日记中写道：“惊闻济之噩耗，伤心之极！老友数十人，逝者已过半了！”“六时许，至耿宅吊慰之，一片白衣冠，伤心惨目。”郑振铎当时是全国文协上海分会负责人，他立即以文协的名义为这位老作家的家属送去一点赙金。翌日日记记道：“六时许，至耿宅，送文协赙赠金去。”由于耿济之家庭经济十分窘困，郑振铎又到处设法为之募捐接济。3月8日日记记有：“为耿事，打电话至各处接洽，已有眉目，大约一千万可到。”3月31日和4月3日的日记，记载了他为耿济之写悼文及传略。4月5日，上午“至静安寺吊济之丧，匆匆写一挽辞送去，惨甚！……二时许，又至静安寺，晤文协诸友，三时许，公祭毕，即回。”5月31日“下午，济之二时下葬。与圣〔叶圣陶〕、予〔周予同〕、伯〔王伯祥〕同至虹桥公葬，凄惨之至！”郑振铎在日记中虽然只是简单地写了“伤心之极”、“惨甚”等语，但是这种真挚的友情是读者都能体会得到的。耿济之逝世后数月，其老父也去世了。郑振铎在1948年1月9日的日记中写道：“下午，二时，往吊济之老父梦蘧先生之丧于万安殡仪馆，凄凉之至！梦蘧先生为报业老前辈，现年七十四，我和济之最早的有稿酬的写作，就是由他介绍的。”他不仅对老友及其父亲的逝世悲痛之至，还为老友遗稿的整理出版诸事到处奔波。

再如，许地山也是他在“五四”时期的老朋友，文学研究会发起人之一。他不幸在1941年8月4日逝世于香港。在逝世前，

许地山还大力帮助了郑振铎抢救民族文献的工作。从许逝世到1942年的日记今未见，但直到1943年6月8日的日记中，郑振铎还提到了“遇蔡、熊二夫人，向询地山夫人事，因欲为地山出全集也。”这是多么深挚的友情！1946年，他写了《悼许地山先生》；直到解放后，郑振铎替许地山编了选集，并亲自写了序言，才了却了这件心愿。还有一位亦为郑振铎二十年代的老友、文学研究会发起人之一的王统照，1957年11月29日病逝。当时郑振铎正在苏联讲学，12月2日晚回北京，第二天的日记记有：“晨闻剑三噩耗，甚为伤感！”直到16日，日记上记有“五时许起，写《悼王统照先生》”。文章中写道：“我刚从国外回来，就听到了王统照先生的噩耗。这个不幸而令人悲伤的消息使我沉默了好几天。我写不出一个字来哀悼他。无言的悲戚不是平常的人对于最沉重的哀悼之感的一般的表现么？……”

郑振铎不仅对上述这样几十年深交、经历风雨考验的老朋友是这样，即对于研究学问上的朋友也是这样。例如马廉（隅卿），在中国古代小说、戏曲、版画等方面，郑振铎均与他有共同的爱好。1931年夏，郑振铎曾与赵万里二人，前往宁波访书，即住在马廉家里，终日高谈阔论，访读古书，甚为相得。郑振铎后来在有关古书题跋中多次生动地记述了这一愉快的往事。马廉早在1935年病故，可一直到1956年4月14日郑振铎重访宁波时，还在日记中写道：“在月湖边站立了好一会。颇怀旧游。隅卿逝矣！似犹闻其语笑。”寥寥数语，情深意长。还有一位潘博山（承厚），也是郑振铎的书友，沦陷期间他们常来往，交流书讯与学问。潘博山见郑振铎爱书如命，深受感动，曾送书给他。1943年3月14日郑振铎日记中记道：“过博山寓闲谈，承贻《明清藏书家尺牋》四册。”当天，他为此书写了题跋，称潘博山“博见广闻，鉴别至精”，并感叹道：“予嗜书而无力，明清诸大家批校本见之而未能收者多矣。阅此诸家手迹，为之慨然！”不料仅隔一月有余，

潘博山即逝世了。郑振铎5月7日日记写道：“闻潘博山君噩耗，为之惊骇不置。……谈版本者又弱一个矣。”当天下午，他即去安东殡仪馆吊丧。5月11日日记，记载了郑振铎与张森玉等人商议为潘博山印遗著之事。7月10日日记又记有去孟德兰路护国寺为他吊丧，并赠赙仪五十元。后在1944年秋为潘氏所辑《明清两朝画苑尺牍》等书作题跋时，还悲痛地写道：“阅之不胜有人琴之恸！”

有道是：“一生一死，交情乃见”。这当然是最能反映一个人的情义和本质的。但即使是平常的交往中，亦何尝不能见出一个人的灵魂呢？——尽管“君子之交淡如水”。郑振铎的朋友极多，如叶圣陶、老舍、郭沫若、王伯祥、巴金等等，他们时或相聚小酌，时或谈文论艺，都在他的日记中留下了温馨的记载。茅盾1947年4月访问苏联归来，特别带来一件俄国睡衣送给他，他很高兴地记在日记上。朋友喜欢的东西，他常毫无吝啬地举以相赠，例如，1943年4月，日记里就记载了赠给王伯祥以《十国春秋》、《水道提纲》等书。王伯祥在郑振铎逝世后，曾写过好几段文字以追念这段往事，至今这两部书还由王氏后人珍藏着，作为先人友情的象征。而对于友人的支持与帮助，他更是郑重地记在日记上。例如，1948年1月，郑振铎因为买书印书而欠了大笔款，新年期间“讨债”者相继上门，弄得他极为烦恼。但就在这时，他的一位二十年代的老友、文学研究会发起人之一郭绍虞来帮他了。1月24日日记记道：“绍虞交来‘合资’（按，指合资编印“陶俑图录”等书）款八百万，他肯加入，诚为‘不安’！为什么老是穷朋友帮忙呢？有此八百，星一的债（按，指星期一有人要来讨债），可以对付过去了，感甚，几出涕！盖及时之助，较之八千八万尤为得力也！”前些年，当郭先生还健在时，我曾将这段日记抄寄给他，据说老先生亦唏嘘久之。凡读到郑振铎日记中的这些地方，人们必然会沉浸在一种人间美好的精神境界中吧！

1941年12月，日本侵略军进占上海“租界”，所谓“孤岛”完全沦陷了。郑振铎为了抢救和保护民族文献，不及转移到内地，便隐姓埋名离家蛰居，保持了高尚的民族气节。整整四年间，他仅在内地刊物上发表了一篇文章。关于他的这一段经历，除了抗战胜利后他在《蛰居散记》及《求书目录》的序中作了些回忆外，其他文字材料极少。因此，今存1943至1945年的部分日记，虽然记载很简单，都是关于他的极为珍贵的生平史料。今亦择要作点披露。

1943年的部分残存日记的突出的内容，是记载了郑振铎在那样危险的环境下，仍继续关注着祖国珍贵文献之被劫与被毁，痛心疾首，深恨自己之无能为力；也反映了他在那样困难的时候，还继续坚持着爱国主义的学术活动。今存这年日记的开头几天，主要记的都是他“阅肆”（即看书店）的情况。如2月12日：“今日为入春后第一次阅肆，至富春、忠厚、来青、来薰，饭后，又至汉文渊、文汇、上海、书林及传新。”一次就去了九家书店。2月15日，他见到张葱玉，得知南浔刘晦之藏书可全售，价六十万元，他又急了，自己又拿不出那么多钱，只得“当即嘱其设法购之。”3月22日，他记曰：“钞清人文集目录廿二纸。约计之，所收尚未及四百种，且佳品无多。若至千种之数，恐不甚易也。可见一事之着手，一愿之立，初若甚易，其结果必至困难重重；然如不中途放手，则当必可遂愿成功也。书此以自励。”可见，他在劫火遍地之际，还有搜罗千种清人文集之计划。4月8日，他又记道：“在寓写清人文集简目毕，计共四百二十八种，虽溢出《清人文集篇目分类索引》之数，然彼所收者，予仍阙二百余种，如能达千部之数，则当可溢出六百种而不至于阙矣。拟尽先收购所阙之二百余种。……仅此四百二十八种，所费已在一万二千金以上矣。诚非穷书生所能负担也。奈何，奈何！好大喜功，贪多务得，予一生之大病，却亦不能戒之。时时拮据，实缘于此。”4

月29日，他又记道：“上午钞清文集目，恰及五百种，已甚为不易矣。尚有百许种，在各肆可觅得。大约假以时日，千种之数，必不难达到也。惟囊空如洗，将来不知如何继续以购。与箴（按指夫人高君箴）愁容相对，亦以拮据故也。用款全无打算，实一大病。时日方长，将奈何？！”^②但谁都知道，郑振铎的这一“大病”，完完全全是出于对祖国文献的热爱啊！

除了买书外，日记还记载了他的一些重要学术活动。例如，1943年6月29日，他记道：“阴雨。写些‘编例’等”，“四时许，偕予同至青年会，晤黎、蒋、孙、萧、严等。共进茶点，谈至六时半散。”7月5日记有：“晨，勉强的写完了‘缘起’。至高宅，又至开明，将‘缘起’托伯祥修正并清写一过。”接着，6日、7日、8日的日记，都记载他起草修改“计划书”。7月13日，又记有“十一时许，至开明。晤王、郭等，正在讨论‘辞〇’（按，原文如此）之编例。调孚云：股东会举出伯祥等为董事，济之等为监察人。取得股息二百五十九元。”这以后不久，日记散佚未见。根据这些不完整的记载，我推断这是郑振铎当时一度发起进行的一次重大工作——编撰出版我国第一部大百科全书。1947年5月号《文艺复兴》上，郑振铎在发表《耿济之先生遗稿》的按语中提及：“我在三十二、三年（按，此为民国纪年）的当儿，曾和友人萧宗俊先生谈过，由他出面，集合十位商人，（都是纯洁而不和敌人们有经济上的往来的）组织一个‘中国百科全书刊行会’，先行集稿，等到最后胜利到来的时候，再行补充，出版。我负责约若干朋友们写稿，……但后来，因为所约的商人们份子不大纯粹，且已为伪方所知，宗俊便和我说，‘恐怕有问题，只好不进行了。’我也同意。”同期刊物上周予同的《悼济之先生》也提到当时他与郑振铎、耿济之等人曾计划编写中国百科全书的事，“虽在万分恶劣的环境里，我们仍然计划着文化方面的工作。”他们这种高度的爱国主义责任感，是多么动人！

郑振铎日记中还多次记载了他当时影印古书之事。例如，1943年3月23日记道：“饭后，至来青阁，与杨寿祺等谈印书事。杨不主张印书目，而力以印‘传奇’为言。俟再仔细商量决定。”后来，1944年7月8日记载：“午餐后，写‘传奇’序”；7月22日又记：“上午，至张宅，传奇已订好样子，颇佳。”这里所记的，就是郑振铎当时影印《长乐郑氏汇印传奇第一集》一书。此书署“甲戌八月印成”（“甲戌”为1934年），序文又署“民国二十三年七月七日”，均是为了迷惑敌伪。有趣的是，我们今天一些同志竟也被“迷惑”了，如近年出版的《郑振铎古典文学论文集》收入了该序文，就误注此书为1934年出版。）其实，该序一开头所说“天时不正，河山如墨，泥泞载道，跬步不得”，正是隐晦而形象地点明了出版时代。当时，他还秘密影印了两辑《中国版画史图录》、《玄览堂丛书》、《明季史料丛书》^③等，有的在日记中也偶有线索可征。1943年5月27日他写道：“忽有一念：拟编《林琴南全集》及《严又陵集》，不知此愿何日得遂？”7月19日又记：“又遇仲彰，谈及印汉简事。穷而好事，不知如何生活得下去？！”这些却都是他当年的未遂之志了。

北京图书馆所藏郑振铎文稿中，有当时他所写的一页读《张司业诗集》的笔记，末云：“初冬午后，日丽风和，晴窗展卷，俗尘尽涤。然诵‘共知路旁多虎窟，未出深林不敢歇’句，却憬然悟此身仍在虎窟中也。”这段话形象地反映了他当年蛰居虎穴之旁的大智大勇、惊险紧张的生活。这在日记中也有反映，如1943年3月12日记：“阴。灰雾滌天，至为闷损。到九时许，方才雾消日出。天尚寒峭。至前面参观张某之新居，布置甚佳，尚未迁入，殆亦一暴发户也。”这个即将成为“邻居”的“张某”，无疑是一个汉奸。4月15日又记有：“游邻居周某氏园，深有所感。”这“邻居周某氏”，就是臭名昭著的大汉奸周佛海！（郑振铎在抗战胜利后写的《蛰居散记·我的邻居们》中，回忆记述了这次

“游园”。) 这些汉奸后来还曾对郑振铎“调查了一顿”，可是他却安然无恙地潜伏到抗战胜利！

“破帽遮颜过闹市”，鲁迅的这句诗也可以用来形容郑振铎当时的斗争生活。他后来在《蛰居散记·暮影笼罩了一切》中提到过一件事：“还有一天，我坐在中国书店，一个日本人和伙计们在闲谈，说要见见我和潘博山先生。这人是清水，管文化工作的。一个伙计偷偷的问我道：‘要见他么？’我连忙摇摇头。一面站起来，在书架上乱翻着，装作一个购书的人。这人走了后，我向伙计们说道：‘以后要有人问起我或问我地址的，一概回答不知道，或长久没有来了一类的话。’为了慎重，又到汉口路各肆嘱咐过。”类似的事在日记中也有记载，1943年6月23日上午，“十时许，携宝（按，即郑振铎女儿）至传新及开明、来薰、汉学等处。……遇盐谷之婿（吉川？），嘱肆夥不声言，乃得不交一语而去。”但是，敌伪却仍不放过他。1944年4月6日，郑振铎记道：“见《新中国报》消息，为之闷损甚！”《新中国报》是汉奸报，查这天该报登载译自日本《大陆新报》的消息，汉奸文人组织的“中国文艺协会将在各地成立，会长由周作人担任”，并无耻地声称郑振铎也是会员。郑振铎当时秘密隐居在上海，苦于不能辟谣声明；但尽管如此，在内地的朋友和同志们都信任他。靳以后来就曾回忆说：“记得有一次，一个无耻的家伙说到他可能气节有亏，我就立刻气愤地加以驳斥。”

郑振铎在隐居期间，仍和地下党保持着一定的联系，这是机密的，但在日记中也偶有线索可见。例如，1944年6月21日记有：“上午，谈及某君事，惨极！”翌日日记云：“上午，至张宅闲谈，购面包为午餐，往探友病，……”。这里的“某君”，我认为就是当年在地下党秘密安排下到上海来治疗癌症的邹韬奋同志，“惨甚”是指他已到了癌症晚期。郑振铎饭也来不及吃即匆匆赶去“探友病”，这正是地下党安排的，反映了党对他的信任。

关于这次见面，他后来在《蛰居散记·韬奋的最后》中作了极为生动的回忆。一月后，郑振铎在7月24日的台历日记上用铅笔添写了这样一句话：“闻季君逝，为之怅然者久之！”而这一天，就是他的亲密同志、伟大的共产主义战士邹韬奋逝世的日子！邹韬奋当时的化名，就叫“季晋卿”。

郑振铎的日记以及笔记，还有很多东西可写，限于篇幅，只得从简。

今存文稿概况

北京图书馆还藏有大批郑振铎文稿，已经编目的，就有322种。今拍成微缩胶卷的，共有22大盘。如果每盘约31米，那么就有近700米之长。这个数目是相当可观的。而且，这中间还有三、四包杂稿尚未曾拍照。

这些文稿的性质，大致可分这样几种：

一是郑振铎的未刊手稿。有解放前的，更多的是解放后的。有创作、批评、翻译、文学研究、美术研究、书目、读书札记、讲课稿、发言稿、书信，等等，内容十分丰富。其中有一些是残稿，或未完成稿。这一种手稿自然是最值得重视和发掘的。

二是郑振铎已刊文章的原稿。很有文物保存价值。其中还有一些草稿、未定稿、修订稿等，可以与发表后的文章相对读，有研究价值。

三是郑振铎讲话、演说、讲课的记录稿。虽是他人所记，仍很有价值，有的他还亲笔作了修订。

四是郑振铎请人誊清，或油印、石印的文稿。其中有的有他的亲笔修改，有的油印、石印稿是解放前他在大学里的讲义。

五是郑振铎已发表的文章的剪报、抽印件、校样、样本等。其中有的校样上，有他的亲笔修改。有的文章，现在较难见到原报刊，

或者至今尚未能找到原刊出处。那些他编印的一“预约样本”，现也成为罕见的“珍本”了。

六是郑振铎请人抄录的稿子。其中有的是他解放后准备编自己的集子时请人代为抄录的以前发表的文章，也有解放前请人抄录的；更有不少并不是郑振铎自己的著作，而是他为了研究的需要，或为编选有关资料，而请人抄录的中国古代小说、戏曲、书目、序跋等。

七是郑振铎所著《插图本中国文学史》出版时所用的插图照片或影印件。

八是混杂在郑振铎手稿中的他人的文章、书信，以及课程表等等。

九是他解放后影印《古本戏曲丛刊》时的大量的毛样。

从上述大致分类中，我们已可看出这批材料性质不一，各方面的价值也是不等的。

文稿价值评述

郑振铎留下的这批文稿，数量相当可观，内容极为丰富。笔者匆匆翻阅，未及详尽摘录，更未能仔细研究，因此，对这座宝库的评述也只能是“巡礼”式的。

第一，全部手稿中最值得珍视的，我认为当是被装钉成五大本、封面题为《木音》的郑振铎1940年初至1941年底致张咏霓的272封信。^④张咏霓先生是著名学者、光华大学校长，1945年7月16日逝世。郑振铎在抗战胜利后写的《求书目录》中，曾写到太平洋战争爆发前二年他在“孤岛”上海抢救祖国文献时，“时时刻刻要和咏霓、菊生、柏丞诸先生相商，往来的信札，叠起来总有一尺以上高。——这些信件，我在‘一二·八’以后，全都毁去，大是可惜。惟我给咏霓先生的信札，他却为我保存起来。”这五

本《木音》也就是张咏霓和郑振铎共同保存下来的十分完整的一批珍贵史料。

郑振铎《求书目录》中的1940年1月9日记曰：“赴校办公，无异状。作致菊生、咏霓二先生函。”这致张咏霓一函，即《木音》中所见的第一封信（原信作“一月十日”），信中说：“久未见，至以为念！前途有二电来，敬钞奉，阅后付丙可也。”这“二电”，指的是重庆国民党当局朱家骅、陈立夫打来的二份回电。这两份抄件幸而未被张咏霓“付丙”，因而今天我们仍能见到，兹照郑振铎抄件原样抄录如下：

何、张、夏、郑……先生均鉴：歌电敬悉。关心文献无任敬佩，现正遵嘱筹商进行。仅此奉复。弟朱家骅叩

张、何、夏、郑六先生大鉴：歌电奉悉。诸先生关心文献，倡议在沪组织购书委员会，从事搜访遗佚，保存文献，以免落入敌手，流出海外。语重心长，钦佩无既。惟值此抗战时期，筹集巨款，深感不易，而汇划至沪尤属困难。如由沪上热心文化有力人士，共同发起一会筹备募款项，先行搜访，以协助政府目前力所不及。将来当由中央偿还本利，收归国有，未量尊见以为如何？谨此奉复，伫候明教。弟朱家骅
陈立夫同叩

回电中所说的“歌电”，指的是郑振铎发起，与张咏霓、张菊山、何炳松等人于5日联名打给重庆政府当局要求拨款抢救文献的电报。从第二份回电中，可以清楚地看出当局对这一爱国提议的态度。在郑振铎他们的一再强烈要求下，后来当时的中央图书馆馆长蒋复璁来到上海，经过商议，决定秘密成立“文献保存同志会”，并由“中英文教基金董事会”（即原“中英庚款董事会”）拨款购书。从2月3日郑振铎的信中，知道他起草了该同志会办事细则十条。后定为七条，经刻写，用红色油墨印出。这份珍贵的文件今也保存于《木音》中。从此，郑振铎开始用公款

为国家抢救了大批珍贵文献，他的信的主要内容就是商讨版本真伪、价值大小、价钱多少等问题。这些信除了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外，还处处洋溢着极其崇高的爱国激情。今略引数段，以见一斑：

我辈对于国家及民族文化均负重责；只要鞠躬尽瘁，忠贞艰苦到底，自不至有人疵议。盖我辈所购者，决不至浪费公款一丝一毫；书之好坏，价之高低，知者自必甚明瞭也！一方面固以节俭为主，同时亦应以得书为目的；盖原来目的，固在保存文献也。浪费，乱买，当然对不住国家；如孤本及有关文化之图书，果经眼失收，或一时漏收，为敌所得，则尤失我辈之初衷，且亦大对不住国家也。故我不惜时力，为此事奔走。其中艰苦，诚是“冷暖自知”。虽为时不久，而麻烦已极多。想先生亦必有同感也。然实甘之如饴！盖此本为我辈应尽之责也。”（1940年3月20日信）

我辈自信眼光尚为远大，责任心亦甚强，该做之事决不推辞。任劳任怨，均所甘心。为国家保存文化，如在战场上作战，只有向前，决无逃避。且究竟较驰驱战场上之健儿们为安逸。每一念及前方战士们之出生入死，便觉勇气百倍，万苦不辞。较之战士们，我辈之微劳复何足论乎！（1940年9月1日信）

此外，信中还反映了当时郑振铎主编影印《玄览堂丛书》的情形，其中有的书就是他抢救所购者。他在信中还建议利用所购图书作些学术研究工作，如编《明史长编》，重编《全唐诗》等等。他认为：“得书不易，应用尤难。我辈如能在短时期内，尽量应用所得书，则诚不虚此番购置之苦心矣。”（1941年1月17日信）可惜此一设想因局势恶劣而基本未能实现。

郑振铎等人奋不顾身地抢救保护文献的行动，是中国现代文化史上一件了不起的爱国壮举。真如郑振铎说的：“创立了整个的国家图书馆。虽然不能说‘应有尽有’，但在‘量’与‘质’

两方面却是同样的惊人”（《求书目录》）。而且，他是那样自觉地、无私地战斗着，就象1941年1月20日徐森玉致蒋复璁信中说的：“罔罗遗佚，心志专壹，手足胼胝，日无暇晷，确为人所不能，且操守坚正，一丝不苟，凡车船及联络等费，从未动用公款一钱。”可惜的是，这样一件动人的壮举却一直很少为人所知，就连他的知友叶圣陶先生也是在近年看了《求书目录》后，“才知道他为抢救文化遗产，阻止珍本外流，简直拚上了性命。当时在内地的许多朋友都为他的安全担心，甚至责怪他舍不得离开上海，哪知他在这个艰难的时期，站到自己认为应该站的岗位上，正在做这样一桩默默无闻而意义极其重大的工作。”（《〈西谛书话〉序》）而更令人气愤的是，郑振铎当时拚着性命抢救下来的国家珍宝，其中很重要的一部分却被蒋介石集团在大陆败亡前用潜艇盗运到台湾去了（上引徐森玉的一封信，今亦藏台北“中央图书馆”。笔者引自台北《传记文学》杂志）。因此，笔者郑重呼吁，有关部门应将郑振铎的这批书信整理出版，这不仅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而且也是爱国主义的文献，同时对于台湾回归祖国也能起一定作用。

第二，郑振铎文稿中值得高度珍视的还有几部未完成的著作稿。如《中国戏曲史》，今见第一、二、三、五、七（残）诸章，从《导言》、《起源》一直到《清传奇与宫廷戏》。虽然没有最后完成，但整部戏曲史的基本轮廓已大致具备了。今似可考虑整理出版。还有《中国绘画小史》、《中国美术史》等，也是有相当篇幅未完稿的。在翻译方面，有在解放前译的佛莱萨（J·Frazer）的《金枝》，译至第四章，约五万多字，未完。这部书中所涉及的民间文学、民俗学的比较研究方法等，对郑振铎启发很大。直到解放后1957年，他还想继续将它译完，后又想请孙家晋续译。

第三，郑振铎文稿中有值得珍视的大量的书目，以及拟编的

丛书，刊物的计划。这些书目，有他自己的各个年代的各种藏书的目录，有他拟购书目和解放前因生活困难被迫售书的书目，也有各种学问的参考书目等等，内容相当丰富。笔者因有《西谛先生与书目工作》专文发表，此处不详谈了。至于他拟编的各种丛书、刊物的目录亦有多种，例如，先后撰写的《中国艺术小丛书》、《中国文物参考小丛书》、《中国艺术文物小丛书》、《中国历史、艺术与革命文物小丛书》等等，体现了他对普及工作的重视。另外他还撰写了《中国文学史资料丛刊》、《中国农学书丛刊》、《中国绘画史资料丛刊》、《古本散曲丛刊》等等书目及编辑计划，对我们都是很有启发的。例如，他拟编的《版本学杂志》，就是一个独创的学术刊物，可惜后来因他不幸牺牲而未办成，但现今的《文献》杂志庶几近之。今录其计划供大家参考：

版本学杂志

(一) 定名为《版本学》杂志，专载有关中国版本的，特别是古代版本的论文及其他考证等文字。

(二) 暂时每季出版一本，每本约十万字，附插图三页到五页。(柯罗版制)

(三) 每期内容如下：

(1) 论文 象《版本学的意义与作用》，《论龙泉出土刻本佛经的时代》，《论〈岳刻石经〉是元代刻本》，《最早的铅印本书籍研究》等等。

(2) 专著 连续登载有系统的著作，象《书目考》、《中国版刻史》，《唐诗版本考》等等。

(3) 杂谈 象《漫步书林》，《×××读书记》，《×××随笔》等等。

(4) 消息 象《安徽访书记》或其他报导新的古代版本书的发现消息等等。

(5) 书评 凡全国解放以来新出版或重版的有关“版本学”

的著作，皆将加以批评和介绍。如有国外出版的书，也应加以及时的评介。

(四) 是同人性质的刊物。编辑由郑、赵、张(珩)、向(达)、张(政娘)诸人负责。

(五) 由文物出版社负责出版。

第四，郑振铎文稿中有些是已经完成，后因故未及发表，而内容又是十分精采的。例如，他在抗日战争上海沦陷期间写的《野狼》一诗，以象征的描写反映了当时险恶的环境和他盼求光明的信念，艺术上很成功，但当时却不可能发表：

野 狼

野狼在嚎，
哀猿在啼，
猫头鹰瞪着圆眼在咕咕的叫，
黑暗把天与地涂成一片。
倦了的旅客独自踟躅在莽原，
前无村舍后无店；
枯树作势欲扑人，
惊窜的狐兔也吓得一跳。
天边远远的有一颗黄星，
是黑漆一片的天地间仅有的光明。
仅这一星星的光亮啊，
已足够使旅人慰安了。

三三、三、六。

再如，郑振铎在三十年代曾辑有《元明杂剧辑逸》，“积稿已盈尺许”，但他估计传说已佚的也是园藏《古今杂剧》可能会重新发现，因而一直没有出版。后来固然不出所料，而且竟是由他亲自发现并为国家抢救收购了这部巨著。因此他的《元明杂剧辑逸》

也就永远不出版了。他所辑之稿今仍存有部份，可见其当初搜辑之勤，但自然今天也不必发表了；然而他1931年4月29日写的《元明杂剧辑逸例言》等文稿，仍具有相当的学术价值。还有，他解放后为普及中国古典文学，曾写有《中国文学的发展》、《中国古典文学中的诗歌传统》、《中国古典文学中的小说传统》、《中国古典文学中的戏曲传统》诸文，他生前均未付发表，近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郑振铎古典文学论文集》中已收录了一些。他还写过《林冲在电影里》一篇评论，深刻地论述了“如何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来处理‘老故事’”，“使那些故事能够有益于今天的群众”的重要问题。此文亦未经发表，今尔康同志已把它收入《郑振铎文集》第四卷中。

第五，郑振铎文稿中有些手稿证实了他曾用过的一些笔名。例如，1957年6月25日出版的《政协会刊》第3期上发表的《配合得更紧密、更和谐些》（署名“禾忠”），1957年9月30日出版的《政协会刊》第4期上发表的《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思想能在社会主义社会里存在吗？》（署名“云纹”）等，均存有原稿。另外，还知道他曾用“依知”的笔名写过《知识分子的前途》等。从手稿中我们还知道了解放后浙江省人民委员会公布的浙江省第一批文物保护单位的目录等，均是由郑振铎亲自起草的。

第六，郑振铎文稿中还有一些未完成稿、残稿、初稿、草目之类，虽然不全，或后来正式发表时作过修改，但也有重要的参考价值，或能提供一些线索。例如，他于1930年4月22日所写的《中国文学史草目》即后来的《插图本中国文学史》一书的大纲，就可以与正式出版时的章节相对照研究。再有，他的一些重要论文，如解放前的《中国小说史的分期》，解放后的《中国小说八讲提纲》、《〈中国文学研究〉序》等，均有初稿保存，与后来发表者颇有差异。他在解放后写的《知识分子是怎样跟着党走的？》一文，虽未写完，但文中提到了他与瞿秋白曾在“五四”时期参加

李大钊为首组织的社会主义研究会，值得注意。还有如《〈近代中国文人志〉序》一手稿，虽残，但也使人知道了郑振铎在解放前确曾为此书写过一篇序。^⑤文稿中还有他为自己的藏书目录写的两篇序，可惜均未完成。一篇写于日本侵华战争劫火中，慨叹“浩劫未终，书囊已空，呜呼，痛矣！”是劫中被迫售书时所作，记述了自己“生平于富贵利禄，玩好珍奇，举无所嗜，而独嗜置书。碌碌半生，无立锥之地。妻仅荆钗，童无璋玉。视渊明之归去，犹有‘方宅十余亩，草屋八九间’者，大不及之。笔耕舌耘之所得，大半耗于图籍；甚至节衣缩食以致之。访肆搜摊，时以为常。遇所欲，必挟之以归，归则呼灯摊卷，欣然相对，时引杯酒自劳。室人或时交谪，不顾也。……”另一篇序，则似作于解放初，残稿记述了自己少年时代苦学的经过，颇有史料价值，也很有教育意义。今录以作为本文的结束：

我开始买书，是在三十多年前。在中学时代，买不起书。家里所藏的《中国魂》、《新民丛报》之类，我都读过不止一遍。此外，便买些《学生杂志》和《青年杂志》（《新青年》的前身）来读。对于线装书是不曾问津过。曾向一位同学那里，借过一部《文心雕龙》，在暑假里抄了一遍。一位同学买到了一部《古今文综》。我十分的羡慕他。曾向他一套一套的借来读。把其中有关于讨论文艺的文章，不论论说、书疏等等，都抄了下来，集成两厚本，名为《论文集要》。一九一七年夏天，我从温州到上海，住在外祖父家里。恰遇张勋之变，不能北上。偶到四马路去逛旧书摊。在一个摊上，见到一部小字石印本的《九通》，只要二元，便把它买了来。把这一大堆的书从四马路携到我的住处虹口是不大容易的。心里觉得饱满，觉得痛快，这是我收集线装书的开始。……

注：

①这批材料今均以郑振铎夫人高君箴捐献的名义登记注册，其中也有少量注明是“文化部赠”。

②至1944年8月，郑振铎因迫于生活，不得不请王辛笛介绍，将这批清人文集出让给金城银行老板周作民。为此他整理了目录，写了一序一跋，备述收罗之苦与这些书的价值。此时共计已得836种。周氏受到郑振铎爱国主义教育，将这批书妥善保藏。解放后周氏逝世，其家人遵嘱将这批书献给了国家。

③《明季史料丛书》也特意署作“共和甲戌八月圣泽园印成”，并化名为“勿秋山馆主人”，也是为了迷惑敌伪。

④据笔者判断，《木音》两字是张咏霓手书。因此，这五册书信也是他亲手装订的。“木音”何意待考，但郑振铎、张咏霓均是博学之士，必有出典寓意无疑。

⑤香港作家黄俊东在《书话集》中，提到杨世骥在1937年左右曾撰写一部《近代中国文人志》，请郑振铎作序。有几家书店也愿意出版。但杨世骥一再仔细校读，最后却决定不予刊布。

作者单位：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

